

市井與圍城

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

鄭毓瑜*

摘要

本文以南朝建康都城文化為例，探索其間宮廷與市井、公眾與私己這些相對社會場域彼此的模擬、挪借與傾軋。一方面從南朝社會空間中士／庶界限的逐漸模糊、寒人素族逐漸成為掌權的發話者（speaker），乃至於影響宮廷廟堂中模擬市井、屠酤為樂的風氣作深入追索；一方面也立足於這個社會環境（social context）重新發現南朝文學上由委巷歌謠至於豔情宮體的發展，其實已經透過作為娛樂體系或挪借為政治話語而成為南朝宮廷文化（court culture）的主流，其結果不但是宮廷有了「市井化」的風情，其實也是假借市井型態放任「私慾化」的權力論述；而這也因此具現了南朝建康彷彿慾望城邦而無法通往庶民樂園的「圍城」意象。

—

針對任何一個地域或城市的社會文化研究，由於牽涉層面極廣，很難獲得所謂整全的面貌。而建康既為南朝的都城，本文從宮廷文化這角度進行討論，似乎比較容易契合都城作為權力階級生活娛樂、交際周旋的場域之特點；當然宮廷文化也必然因為集團、個人表現不同而有諸多面相，本文僅選取趨向市井型態這一側面加以探察，期望為宮廷與市井及其所衍生的公眾與私己這些相對

關鍵詞：南朝、建康、宮廷文化、市井型態、社會空間、城市意象

*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社會領域彼此交錯、挪借的文化現象，揭示更為清晰的面目。而文化由於是歷史發展的累積與演化，必然會形成前後承續或對比的情況，本文的論述過程因此不但以東晉建康的文化流風為開端，而且後文論述中亦援引為對照的背景。

建康，先秦楚號金陵，秦改為秣陵，東吳孫權於建安十六年遷都於此，次年改稱建鄴，¹西晉末年司馬睿採用王導建議，渡江鎮守建鄴，永嘉七年改建鄴為建康，²建武二年（西元 318）司馬睿於江東稱帝，建康成為東晉首都，後來南朝四代也都建都於此。顯然，建康不但是六朝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六朝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核心場域。歷來論述建康城，以現今可見具體成書者如唐許嵩《建康實錄》、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乃至明、清間成書的《應天府志》、《江寧府志》等，可以說是匯集了「建康史」之大成，分別在地理形勢（山、川、河、湖）宮城建築（另包括寺廟、園宅、陵墓）以及人物掌故各面向，累積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當代的研究以史料配合出土文物，針對都城形制、貿易交通等都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描述，比如從城磚的原料、色澤的不同，尋索出都城與石頭城遺址，³從古墓出土的玻璃杯和玻璃碎片，考證出東晉時期與東羅馬及波斯有貿易關係。⁴所有關於建康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具體的圖表（如都城規劃、園宅分布）數據（如人口結構、出使及征戰次數），⁵同時也明顯偏重在講求精確（accuracy）的客觀事項（objective facts）上。

然而建康城作為一個社會空間（social space），這些各個分立的事項其實與人情經驗相互穿織，經過主、客觀協調之後，成為展現文化價值或社會關係的環境型態。⁶比方說，建康城西南的新亭，是東晉初過江諸人最常邀集飲

1 參見《建康實錄》卷1，「建安十六年」，「建安十七年」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370 冊，1986）頁 370-236。

2 同前註卷 5，「永嘉元年」，「永嘉七年」條，頁 370-287、370-289。

3 參見羅宗強，對南京六朝都城的一些看法，《中國古都研究》第二輯（1986.9），頁 162-164。

4 參見郭黎安，試論六朝時期的建業，《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1985.4），頁 283-284。

5 可參考如朱僕，《金陵古蹟圖考》（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據商務印書館 1934 版影印），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等。

6 人文地理學者 Yi-fu Tuan 在“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Implications for geographical research”一文中談到文學書寫可以提供地理學者三個思考面向：如尋找人文經驗及關係型態所構成的社會空間；尋索如同藝術作品所透露的對環境的理解與文化價值的熔鑄；最後在地理分析中嘗試達到一種主、客觀的平衡。見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宴之處，周顛並且認為「風景不殊」，只是江、河之異，這固然可以從洛陽和建康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來加以解釋，⁷但是如果也考慮西晉名士常常共至洛水戲游談道，那麼新亭所在更深刻的感受應該是如何在江東復現這種名士文化活動中共感的氛圍。又比如從歷史資料可以清楚序列東晉建康宮城、都城由簡陋走向華麗的建築時間表，但是如果同時也注意到桓溫治江陵（荊州），層樓疊觀早於謝安主持興建的建康新宮，那麼兩座城市的華儉較量，毋寧也成為當時朝中閫外強弱關係的具體象徵。⁸

換言之，外在空間的實踐其實與內在意識的象徵相互表裡，一個都市可以是某種意象化了形式，而人們正是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共通的意象，來「看到」這座城市或發展出對於這座城市的認知。顯然這個城市意象並不就等於從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城市，當然也不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互動下的經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浮顯的立體座標。⁹從這個角度重新看待建康，因此可以發現，過江之初，面對地促勢卑、無力北反的事實，建康既無華麗宮城，又尚未完備禮制，更因禍起蕭牆而屢遭戰亂；這時候王導、庾亮諸人是如何傳續正始以降的名士風流，而在原本左遷的地域、弱勢的政局中銘刻下永恆的都城風景。《世說新語》言語篇 記載王導孫王東亭與人論姑孰城與建康城的建築巧拙：

宣武移鎮南州，¹⁰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無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¹¹

edited by David Ley and Marwyn S. Samuel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8, pp. 194-206.

7 見前註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170-171。

8 以上二例詳細分析請見鄭毓瑜，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27，2002），參見頁8、13-15。

9 對於都市空間文化的分析，參考曼威·柯思特（Manuel Castells）都市象徵（The Urban Symbolic），夏鑄九譯，及葛迪樂、拉哥波羅斯（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都市與符號（導言），吳瓊芬等譯，皆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分別見於頁539-547及頁505-526。

10 桓溫曾一度移鎮姑孰，見《晉書》，卷98 桓溫傳，頁2575。

11 《世說新語》，言語篇 第102則，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6），頁

在制置上紆曲或平直表現，當然同時對比東晉前期兩位朝廷重臣的勳績功業，王東亭於是從紆曲的建康城使原本地促的江左若「深不可測」，來詮解王導的巧思。然而，如果從王導好尚玄虛而具有名士作風這一面來看，相對於嚴峻整飭的「憤憤」政風，不也同時表現在相對於平直條暢的紆餘委曲；建康城的建築因此刻畫出王導及其所延續自中原的「邁達沖虛」、「玄鑿勁邈」¹²的文化版圖。¹³

可以說意象化了的名士風流因此就體現在東晉建康城的空間形式上，而這樣的形式主題自然會引向某種機能或效應，亦即意象透過都市空間為媒介而與機能效應相互依存。東晉於王導之後，以謝安主政最同於王導的寬和簡易，當時許多逃亡的兵士僕役，都流竄到建康城南，秦淮河邊的船舫中，有人要求搜捕，謝安說：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¹⁴

從空間常識而言，都城因為匯聚五方、人物混雜而藏匿不法，是很自然而正常的現象，¹⁵但是，謝安所言顯然不僅止於空間常規，而是一種放曠而去煩細的悠游風情，這可以對比東晉以下宋沈璞與齊王儉的做法而得知。同樣是面對「號為難治」的京邑所在，沈璞「以清嚴制下」，使「姦吏斂手，猾民知懼」；¹⁶而齊高帝「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卻引用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而認為「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¹⁷據史書所載，王儉常謂

122。

12 引自《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65 王導傳 所錄 諡王導冊，頁 1753。

13 詳見 東晉建康論述 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 一文，頁 20-21。關於「憤憤」政風，《世說新語》政事篇 第 15 則載王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王導的「寬和得眾」，正與庾亮的「任法裁物」相反，陳寅恪 述東晉王導之功業 就特別談到「東晉初年既欲籠絡孫吳之士族，故必仍循寬縱大族之舊政策」，江左之所以能立國五朝之久，王導之「憤憤」政風實為主因，見《陳寅恪全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 52-54。

14 《世說新語》，政事篇 第 23 則，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143。

15 參見《六朝的城市與社會》書中對謝安所言的解釋，頁 152。

16 沈璞事見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卷 100 自序，「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為難治」以下所述，頁 2462。

17 見《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2 王曇首 傳附王儉，頁 592。

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此自況也；¹⁸那麼在面對舛雜且多盜賊的建康，王儉所以展現和謝安一樣寬容的治理態度，顯然就不在於視京邑之雜亂為理所當然，而是因為將名士風流具體實踐於都城的形制機能中。

然而，單單因為王儉的例子，並不足以認定南朝的建康仍舊偏向以名士風流為主導意象的空間氛圍。如果城市意象的產生是來自於社群間彼此的角力互動，那麼宋、齊以來士人流風的逐步轉變，就不能不成為考察城市意象主題的關鍵。以宋人孔覲為例，其「為人使酒仗氣」、「尤不能曲意權幸」，「性真素，不尚矯飾」，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而「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可見入宋以來，社會風氣是轉趨於汲營，相對於真素清約的希罕難能，當時士大夫的表現就像孔覲弟道存、從弟徽，善於聚斂經營，自外郡東還，「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類」，孔覲正色曰：

「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¹⁹

當時外郡牧宰除了朝廷薪俸，還有當地雜供、百姓餉餽，任滿或請假還京，往往帶著外郡搜刮的財富或將土產運回京城販售營利，²⁰所謂士流與賈客，顯然漸漸泯除了分別。而這種重財貨的心態，與魏晉名士風儀的格格不入，還表現在宋、齊之際的褚淵（彥回）身上。褚彥回美姿儀、善容止，「時人以方何平叔」，²¹宋明帝時長淮為北境，²²江南無鯁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值數千錢，人有餉彥回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門生獻計賣之，彥回變色曰：

「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²³

18 見《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23 王儉 傳，頁436。

19 孔覲事見《宋書》，卷84，頁2155。

20 參考《六朝的城市與社會》中對於「外郡還資」的說明，頁86-87。

21 此句見於《南史》，卷28 褚裕之 傳附褚彥回，頁749。《南齊書》，卷23 褚淵 傳未見此語。

22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12冊，1986）卷十三述「宋重鎮」下云：「明帝時後魏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為北境」，頁312-191。

23 《南史》，卷28，頁751；《南齊書》未見記載。

然而，褚彥回雖然不重財貨，卻因宋末歸心齊高帝，世俗頗以名節譏之，當時百姓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²⁴甚至褚彥回子褚賁、從弟褚炫、褚炤等皆恥彥回之身事二代，而有棲退之志。彥回入齊後拜司徒，褚炤嘆曰：

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²⁵

顯然重財貨或不持守節操都是影響士流質變的重要因素，若再加上南朝以來士族勢力逐漸衰落，政治實權漸漸為布衣寒人所取代，整個社會關係結構的轉變就直接表現在生活形態、施造翫好各方面，而呈現出不同於放曠任真的空間氛圍。

以時人方之何晏的褚彥回，和自比謝安的王儉為例，雖然二人風神出眾，且「務弘儉約」、²⁶「寡嗜慾 車服塵素，家無遺財」²⁷，但是面對朝中以寒人而入見親倖的阮佃夫、茹法亮等公然貨賄、奢華成風，也莫可奈何。史載宋明帝崩，褚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共理庶事，未嘗驕倦，然而當時：

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²⁸

而齊武帝時茹法亮、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大納財賄，廣開宅宇，太尉王儉常謂人曰：

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²⁹

即便是身居高位的王儉、褚彥回都不如阮佃夫、茹法亮等寒人機要有權有勢，而如同王導、謝安這些主導東晉大局的風流人物又僅能成為緬懷的過往，儉約或者閑遠的名士意象顯然逐漸在南朝的建康城中失去了主導的地位。

24 《南史》，卷 28，頁 753。

25 以上關於褚賁、褚炤、褚炫事，皆見《南史》，卷 28，頁 754-758。

26 《南齊書》，卷 23 褚淵 傳，頁 426。

27 《南齊書》，卷 23 王儉 傳，頁 438。

28 《南齊書》，卷 23，頁 426。

29 《南史》，卷 77 恩倖 茹法亮傳，頁 1928-1929。《南齊書》，卷 56 倖臣 茹法亮傳未見王儉此語。

二

城市意象的轉變既然是社會關係結構中相互拉鋸、調協的結果，必定是在人物、事例、環境施造上都有系列性的變革與發展，亦即是身心內外、尊卑上下成系統的游移、變位而漸漸被「看」出新輪廓的有意味的空間形式。當然，任何新意象的出現並不代表舊意象的消亡，正是隨時相對的狀況，才能比較出新／舊的意義。所謂「城市意象」因此不是分明的汰舊換新，而是在原本的氛圍中允許某種新成份的參與，透過制約與新變的相互對話、交錯演練，才能分辨出文化型態的不同邊界。

就社會空間中最重要權力結構而言，一般都承認世家大族是六朝最具影響力的階級，「以士庶之別，為貴賤之分」，即使是建功立業、身居高位的寒門素族，亦不免有愧懼之色；³⁰ 然而反過來說，就正如趙翼於《二十二史劄記》中指出的「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為國宣力者，亦皆出於寒人」。³¹ 這個功業／門第或說是權位／出身的兩不相應，一方面固然揭露南朝以來士族重文輕武、不理庶務，尤以保家重於衛國等弊端積習；³² 另一方面如果「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³³ 這不但牽涉士／庶在政治實權上的此消彼長，同時也必然是王、謝所引領的士族文化品味、生活型態面臨挑戰的重要關鍵。

宋高祖劉裕藉北伐中原、外積武功而建國稱帝，曾於宴集時，謂群公曰：

30 詳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卷十二，「江左士族無功臣」條下所述關於六朝門第定制，如張敬兒、陳顯達、王敬則等雖功高位重猶不得與士族並列之事例。見頁157-158。。

31 同前註，頁158。

32 趙翼認為高門大族「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又「以自保其家世」為念，故無法奮立功業，同前註；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修正趙翼說法，認為江左世族非無國士，只是與寒人相較，為量特少，並臚列包括「時主猜忌」、「保族固寵」、「謝絕庶務」、「世俗輕武」、「德衰體羸」、「起兵地域」等六項原因，頁19-32。換言之，門閥士族在政治場上的日居下風，有其本身積弱的因素，不必然全因君王重用寒人加以牽制，可參考如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尤其書末後論七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可視為全書總結，頁357-360。

33 同註30，頁158。

我布衣，始望不至此。³⁴

劉裕說這個話的時候，作為南朝第一個布衣天子，語氣中的喜出望外以及帶著試探性的惶恐不安，是可以真切感覺的；當時擁立高祖的布衣之徒如傅亮等正欲盛稱功德，唯王導曾孫王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³⁵出身高門大族的王弘，顯然不肯輕易稱揚劉裕的北伐武功。其實劉裕自己在位居宰相後，就想改變「少事戎旅，不經涉學」的背景，也開始談辯論理，效慕風流，人皆依違之，時有鄭鮮之毫不寬假，每至高祖辭窮理屈乃止。劉裕只好自承「我本無學術，言義尤淺」。³⁶至於書畫琴棋更非所長，劉穆之就要劉裕乾脆「縱筆為大字」以藏拙。³⁷這些事例顯示，劉裕固然無法學得言談風流，獲得士族認同；同樣的，士族流風也逐漸無法成為南朝以來追逐權位的必要條件。經國理政，究竟需不需要讀書萬卷、文義從容，在東晉王、謝身上根本不成問題，在南朝卻有另外一種看法。劉裕當年自己無學術而居相位，佐命有功的第一位，就是同樣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的徐羨之，但是一旦居廊廟，「咸謂有宰臣之望」。³⁸當時功臣同列有才學辯博的傅亮、謝晦，徐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就如此評定高下：「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³⁹

齊高帝雖然也與劉裕一樣明言「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但是他「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⁴⁰是具有名士流風的布衣天子。不過，之後的齊武帝，曾經因為寒人機要劉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而如此對比：

「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⁴¹

34 《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卷42，頁1313。

35 同前註。

36 《宋書》，卷64 鄭鮮之 傳，頁1696。

37 《宋書》，卷42 劉穆之 傳，頁1305。

38 《宋書》，卷43 徐羨之 傳，頁1331。

39 《南史》，卷15 劉穆之 傳附徐羨之，頁433。

40 《南齊書》，卷2 高帝 紀，頁38。

41 《南史》，卷77 恩倖 劉係宗傳，頁1927。唯《南齊書》，卷56 倖臣 劉係宗傳作「（齊）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沈約、王融為永明文學的代表，齊武帝舉以為例，一方面因為二人「博涉有文才」⁴²「篤志好學，晝夜不倦」⁴³；一方面則因以竟陵王子良為首的永明文人集團，於創作詩文、校錄古籍成就顯著，⁴⁴然而並非武帝所著重的「吏事」。後來齊明帝也有同樣的看法，當江祐上書推薦「博通經傳」的明山賓：

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⁴⁵

至於梁代，梁武蕭衍與齊高同族，亦非高門，而武帝曾為永明八友之一，⁴⁶藝能博學、下筆成章，同時也勤於政務、孜孜無怠，顯然讀書、經國二者兼顧而不偏廢。⁴⁷大同五年以何敬容人為尚書令，則可以某種程度反映梁武選人任事的一個看法。何敬容出自名門，「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⁴⁸，然而如此名士風儀的另一面，是「出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⁴⁹，長於吏事、勤於庶務的這部份，就為時俗所嗤鄙，甚至針對他「拙於草隸，淺於學術」⁵⁰加以嘲戲。史載「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⁵¹，這自然是綜論概觀之詞（如劉裕顯然就無法從容言論），不過何敬容因「恪勤匪懈」遭致「鄙俗」之譏，⁵²這說明「尚玄遠」、「貴放誕」的名士風氣仍然存在南朝文化環境裡，然而從另一方面說，如果何敬容已經打破一直以來清貴放逸的宰臣形象（如東晉王、

42 《南齊書》，卷47 王融 傳，頁817。

43 《梁書》，卷13 沈約 傳，頁233。

44 《南齊書》，卷40 武十七王 竟陵王子良傳記載：「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永明）五年，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頁694、頁698。

45 《南史》，卷50 明僧紹 傳附明山賓，頁1243。

46 《梁書》，卷1 武帝紀，頁2。

47 同註46，卷3，頁96-97。

48 《梁書》，卷37 何敬容 傳，頁531。

49 同前註。

50 《南史》，卷30 何尚之 傳附何敬容，頁796。

51 同註48，頁532。

52 《南齊書》，卷37 何敬容 傳末錄陳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頁534。

謝；宋王敬弘），⁵³顯然這個文化環境裡已經容許某種歧異的發展。

陳代姚察針對何敬容事例，除了感嘆「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也批評朝中瀟灑清貴放逸之風，是使：

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⁵⁴

是不是祖尚玄虛就一定隳廢國事，其實因時而異，比方說東晉偏安江左，正始玄風就成為延續中原正統的文化表徵，論理談道成為必要的生活型態，也是當時彼此周旋往來的政治策略；⁵⁵所以如果深入分析姚察批評的重點，這句話與其說是批評玄風，還不如說是批評學步風流而為朝廷所寬縱的士族子弟，因為浮華迂誕而予小人干涉朝政的機會。《顏氏家訓》涉務篇有一段話說得清楚：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以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維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

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仗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

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⁵⁶

這段資料從晉室渡江之初，為安定政局而極力籠絡士族的策略談起，即使世家子弟多高論浮文仍美其名曰清高，適為掩護其顛預無能之病。而南朝以來帝王逐漸疏遠士大夫，正因為寒素容易驅使，又能經理實務。這當中除了實用價值，明顯還牽涉君王是否能貫徹威權的問題。自劉宋以布衣為天子以來，這問題日益浮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發生在宋孝武帝與齊武帝身上。宋孝武時，路慶之（太后兄）孫路瓊之，嘗「盛車服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且嘲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太后怒，涕泣於帝，帝曰：

53 同上姚察所言：「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

54 同註 52。

55 詳見 東晉建康論述 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 一文。

56 《顏氏家訓》涉務篇，引自王利器集解本（臺北：明文書局，1982），頁 292。

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⁵⁷

宋孝武帝表面上保持尊重士族的態度，但僧達「屢經犯忤」，最後宋孝武見其終無悔改，就藉故構陷，於獄賜死。⁵⁸另外，齊武帝時倖臣紀僧真曾向武帝「乞作士大夫」，武帝要僧真自己去找當時士族子弟如江斡等，結果喪氣而還，齊武帝說：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⁵⁹

時人稱讚江斡「不為權倖降意」，不過，齊武帝自己並不這麼心甘情願面對士／庶之別，他認為紀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並說：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⁶⁰

這評語在極力賞嘆中，刻意對比出對於士／庶區別的不滿甚至是不屑，與紀僧真乞作士大夫遭拒事難脫干係，而與齊武自己帝王之尊卻奈何不了門第觀念，還間接受辱，自然也有關係。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認為魏晉時大臣當國的局面，到了南朝諸君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除了他所提及高門大族「罕以務事關懷」，⁶¹如前述應該還有君王無法貫徹威權的顧慮。因此真正能博取帝王信任，尤其是讓南朝以來的素族天子引以為腹心者，唯有也出身寒賤的機要近臣。趙翼認為在士族不可用的情況下，南朝君王才「不得不用寒人」任機要；⁶²但是由齊武帝賞愛紀僧真的例子看來，這「不得不」也許已轉化為彼此相濡相須的親近。蕭子顯就明白說到寒人倖近「探求恩色，習睹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最後

57 事見《南史》，卷 21 王弘 傳附王僧達，頁 574。

58 同註 57，頁 575。

59 《南史》，卷 36 江夷 傳附江斡，頁 943。

60 《南史》，卷 77 恩倖 紀僧真傳，頁 1926。《南齊書》卷 56 倖臣 紀僧真傳作「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頁 974。

61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卷 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下所述，頁 106。

62 同註 61。

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⁶³顯然不只是因為寒人「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⁶⁴更重要的是寒人近臣可以揣摩迎合帝王心意，或甚至是可以參與導引朝政施行。比方說宋孝武帝時信任巢尚之、戴法興，「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而孝武生性嚴暴，動輒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⁶⁵這樣一來，原本君王與士族的權力拉鋸，轉成了君王權力下放給寒人機要；南朝素族天子固然抑制、削弱了門閥勢力，但是沒想到要面對的是日益坐大的權幸小人。

以宋孝武親信戴明寶、戴法興為例，史書記載二人「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尤其驕縱，長子戴敬甚至與君王爭買御物，六宮出行，戴敬竟盛服騎馬於車左右來往逐馳，而宋孝武帝雖大怒，後來還是委任如初。⁶⁶前廢帝繼位，戴法興更加專斷，時市里風謠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廢帝怒將法興免官、賜死。⁶⁷蕭子顯說「(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⁶⁸其中有人才如巢尚之，自然也有佞倖如戴法興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庶民寒人與素族天子相結合，對於整個南朝政治權勢結構的影響力，明顯撼動一般印象中的門閥士族；⁶⁹換言之，建康城作為一個社會空間，隨著士／庶階級在政權結構中的上下拉鋸，原本卑微的受話者 (listener) 轉成了新的發話者 (speaker)，同時自然享有參與定義或重建城市意象的權力。

三

如果以「名士風流」作為東晉建康城的一種代表意象，那麼轉而由素族天

63 《南齊書》，卷 56 倖臣 傳史臣曰，頁 979。

64 同註 61。

65 《宋書》，卷 94 恩倖 戴法興傳，頁 2303。

66 同註 65。

67 同註 65，頁 2304。

68 《南齊書》，卷 56 倖臣 傳前言，頁 972。

69 如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臺北：帛書出版社，1985），頁 105-138；劉漢東《混亂與重構－魏晉南北朝社會與階級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第一章第三節 庶族寒人的政治崛起，頁 15-20，對於南朝士／庶界限的模糊與庶人掌握實權的事實都有討論。

子、寒人近倖參與構築的健康意象，也許可以從「市井型態」這個側面進行探討。大眾所表現的「市井型態」(a marketplace style of expression) 挪借自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嘉年華」(carnival) 的觀念，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⁷⁰ 書中，以源自中世紀而在文藝復興時期作家拉伯雷筆下的節日狂歡為例，從兩個主要面向加以闡釋：其一，是社會政治意義，「嘉年華不是一個為人們觀看的場景，人們在其中生活，人人參與，因為嘉年華的觀念擁抱全體大眾」；⁷¹ 亦即這個狂歡盛宴是一個全民參與的活動，它不同於官方或教會活動的地方，就在於所有階級、權威的倒錯顛覆。其二：就文化審美意義而言，嘉年華會發展出一種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溝通形式，「它致生一種新型態的市井言行，坦白、自由，允許人群之間毫無距離，而且脫除了在其他時刻被要求的禮儀成規」；⁷² 在嘉年華氛圍中的言行可以親暱、直率、淫穢、嘲諷，挑戰了官方正式場合中褒貶分明、雅俗對立的言行標準。⁷³ 當然，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南朝在士(尊)/庶(卑)階級的衝撞上，固然與嘉年華泯除身分的參與有著初步的相似性，但是建康城中的遊宴歡會，究竟算不算反官方的全民活動，或只是素族天子與寒人機要聯手，突破原本由士族主導的宮廷規約的活動？其二，在言行表現上，宮廷間由從容玄遠轉成狎謔粗鄙，固是某種程度的解放，但是否企圖以平民文化顛覆菁英、貴族文化，進而深刻凸顯「自由自在的嘉年華精神，以及面向未來的烏托邦性格」？⁷⁴ 當然，西方理論一旦旅行到他方，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環境產物

70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elene Iswolsk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中國，「市井」這詞語的應用相當早，如《孟子》萬章 下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引自朱熹《四書集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孟子集注》，卷10，頁12a，是指相對於草莽的都邑街市，後有所謂「市井之徒」、「市井無賴」等描述街市間粗鄙庶人，至於是否形成特屬於中國的「市井論述」則待他日另文討論；本文所以暫時取用巴赫汀的「市井型態」作為討論的方便，其實是希望在差異對比之後，開啟「市井」論述可能的理想狀態，提供中國文學所謂「雅/俗」分辨、轉化之外，另一種自由而豐富的全民參與的烏托邦式文化遠景。

71 同註70，頁7；中譯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267。

72 同註70，頁10。

73 以上兩個分析面向及解釋，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261-285。

74 同註70，頁33。

的交遇、修正、反思的過程，⁷⁵ 巴赫汀「嘉年華」的觀念在啟發視界之外，因此更適合作為「看清」建康文化層次的對照組。

南朝諸帝既出身布衣素族，沒有高門大族習以為常的朝堂儀度、宮闈常規，因此自宋以來，帝王突破宮禁，好遊走道塗、出入市里的例子，較諸前朝顯得頻繁。在公眾群聚的開放空間，尤其是交易、消費或慶典場合，通常是人聲鼎沸、車馬往來，其間摩肩接踵、高呼大喊帶來的暈近、隨便，對於原本位居中心地位的君王，明顯有一種解放社會規範而流向通俗、邊緣的無比趣味。⁷⁶ 齊廢帝（鬱林王昭業）為南郡王時，就曾經因為其父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而抱怨身在帝王家：

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⁷⁷

廢帝少為竟陵王子良所攝養，矯情自飾，私下其實「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人許，共衣食、同臥起」，竟陵王移西邸而獨住西州後，則每夜開後堂閣，「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即位後不但微服遊走市里，又多往文帝⁷⁸ 崇安陵隧中，「與群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⁷⁹ 齊明帝後，東昏侯立，不接引朝士，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更是肆無忌憚，或於宮苑中立店肆、模大市：

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貴妃）為市令，帝為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⁸⁰

或四出遊走，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又詣潘妃父寶慶：

75 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旅行的理論」，請參考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一文對此理論越界所形成的跨文化過程的深入分析，《中外文學》25：3，頁224-233。

76 城市中的市集（尤其是夜市）空間在中心——邊陲、文雅——庸俗上的偏移象徵及所提供的樂趣，參考余舜德，〈空間、論述與樂趣——夜市在臺灣社會的定位〉，收入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5），頁391-462。

77 《南齊書》，卷4 鬱林王 本紀，頁73。

78 此文帝乃指武帝長子文惠太子，鬱林立，追尊為文帝，葬崇安陵，見《南齊書》，卷21 文惠太子 傳，頁402。

79 以上所述見《南史》，卷5 齊本紀 廢帝鬱林王，頁135-137。

80 見《南齊書》，卷7 東昏侯 紀，頁104。

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⁸¹

身分地位的上下顛倒，配合言語行止的倒錯翻轉，南朝宮廷中「市井化」的傾向明顯迥異於東晉從容玄遠的廟堂雅望。

根據《世說新語》記載，庾亮一次造訪周顛，庾肥周瘦而相互取笑，周顛回答自己的消瘦並非有所憂煩，而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⁸²言下之意，庾亮的肥碩恐怕是渣滓污垢日積月累的結果了。這樣的揶揄並不點明道破，透過言語機智反而有心領神會的莞爾。而《宋書》記載前廢帝也曾狎侮王公大臣形體狀貌，但做法就大異其趣：

（始安王）休仁、太宗（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前廢）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豬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阱，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⁸³

在這個戲謔場景中，充斥著粗鄙（言語）、污穢（泥水）以及低下（裸身就槽而食）的言行，完全解構廟堂端嚴雍容的氣勢。然而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並不是每個在場者都是參與者，也就是說並不都是可以被戲謔的人，前廢帝明顯就作為旁觀者，像一個等待被取悅的觀眾；而諸王公大臣才是被編派而完全不是自發的演員。這與擁抱全體大眾的理想「市井型態」根本上就有所出入。另外一個例子，史載宋後廢帝無日不出宮牆，夕去晨返、晨出暮歸：

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行人。有白梃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群聚飲酒，以為歡適。⁸⁴

在這則資料裡，帝王的確走入人車喧囂的市井之中，甚至與挽車小兒圍聚飲

81 見《南史》，卷 77 恩倖 茹法珍傳，頁 1934。

82 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言語 第 30 則，頁 70-71。

83 見《宋書》，卷 72 文九王 始安王休仁傳，頁 1871-1872。

84 見《南史》，卷 3 宋本紀 後廢帝紀，頁 89。

酒；但同樣的，這種歡適並不具有彼此一體的全民性，這個發話者的歡笑不是與大眾一同開懷大笑，大眾甚至因為這個發話者的威嚇殺戮而畏懼躲避。⁸⁵

換言之，君／臣、君／民的階級分別依然存在，宮廷的「市井型態」不過成為上層階級操弄的娛樂，尊卑易位、變雅從俗這些種種界域的跨越，其實都是為了滿足私己縱恣癡狂的慾望。當然，從歷史記載中可見，如漢高祖劉邦亦「嫚而侮人」、漢末崛起的曹操也有「佻易無威重」的一面，⁸⁶然而都不若南朝出現得如此頻繁，這顯然不單單是君王個人品行的問題，亦即宋、齊以來系列昏君廢帝趨向市井化的行徑，其實與社會空間中因為士／庶階級在政治權位上的升降所引生的言行表現、人倫品賞的價值轉換有關係。如前述，這些跨越尊卑、雅俗的行徑，其目的不是為了消解距離，反而建構了新的社會距離。而決定這個新的社會間距的因素，則是從原來的門第世系、學問教養，解放為赤裸裸地職權勢位的爭逐、金銀財貨的較量。以宋初徐羨之、王華為例。宋武帝晏駕，徐羨之與傅亮、謝誨等同被顧命，後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然而少帝若廢，次第在盧陵王義真，羨之等素以義真德輕於才，不任主社稷，乃先廢義真，再廢少帝，⁸⁷後徐羨之又使人將兄弟二人殺害，再立劉裕三子義隆（文帝）。當時朝中與羨之素不相合的范泰說：「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⁸⁸即使是稱賞徐羨之「曉萬事、安異同」⁸⁹

85 巴赫汀認為「市井話語」(the style and tone of the marketplace)(劉康譯為「公眾廣場的話語」)「實際上就是叫喊聲，在人群中的高聲大喊，來自人群也以人群為對象。說話者與人群為一，他既不與群眾對立，但也不教導、詛咒或威嚇大眾。他與大眾一起開懷大笑，言談中沒有絲毫的嚴肅正經、沒有害怕、虔敬或謙遜。這是一種自由坦白，完全快樂、無畏的話語」，引自Rabelais and His World, 頁167，中譯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頁270。

86 查閱《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魏志》(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及《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諸本紀，帝王喜好鬥雞走狗或狎侮臣屬的記載如下：漢高祖「嫚而侮人」(卷1，頁56)、漢宣帝亦「喜游俠，鬥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卷8，頁237)、漢成帝曾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鴻嘉元年，上始為微行出」顏師古注引張晏所言，卷10，頁316)、東漢靈帝列肆於後宮，又於西園弄狗(卷8，頁346)、魏武帝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卷1，頁54)，兩晉諸帝似無此類載錄。

87 見《宋書》，卷61 武三王 盧陵孝獻王義真傳，頁1636。又參《南史》，卷10 宋宗室及諸王 盧陵王義真傳，頁365-366。

88 《宋書》，卷60 范泰 傳，頁1620。

89 《宋書》，卷43 徐羨之 傳，頁1331。

的蔡廓，也如此明白告訴謝誨：

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⁹⁰

從蔡廓、范泰的話語中，除了批評徐羨之等人作為失義背德，更有一種意料之外的震驚，這份震驚固然是由於既已廢之又趕盡殺絕的殘酷；然而另外在王華安慰文帝的一段話裡，可以看到更深層的疑慮，是對於徐羨之、傅亮起自布衣寒士，卻行廢立大事的無法釋懷：

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陛下寬叡慈仁，天下所知，羨之、亮、誨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⁹¹

這段話表面上作為慰解，其實是透過比較加以揣測；作為對照的二人是建立晉朝的司馬懿以及東晉初年所謂「王與馬，共天下」⁹²的王敦。王華為王弘從祖弟，亦為琅琊王氏後人，這句話除了表面上指徐羨之等人無司馬懿篡魏與王敦奪晉的野心，深入來說，一方面指徐羨之等人才略不如司馬懿（所以只是「中才」），一方面則認為「寒士布衣」的背景也無法有琅琊王氏當年權傾江左的氣勢。就後一點看來，王華雖然根據世家門第作為判定個人成就高低的尋常準則，但面對徐羨之等人行廢立、戮嗣君的事實，門第優先的社會價值標準顯然難以紓解疑慮；所以最後加上徐羨之等五人同功，終究勢力分散的局面，來推助宋文帝入奉大統。⁹³

其實，王華揣測徐羨之「非有王大將軍之心」，除了慰解宋文帝，毋寧也表露對徐羨之寒人出身而背德專權的憤慨與不滿。因此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

90 《宋書》，卷57 蔡廓 傳，頁1572-1573。

91 《南史》，卷23 王華 傳，頁626。

92 引自《晉書》，卷98 王敦 傳，頁2554。

93 《宋書》，卷63 王華 傳中，就根本沒有「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此句，而只是說徐羨之等應該不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服」來紓解文帝疑慮，頁1676。

登樓賦「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詫，嘆曰「當見太平時不」？⁹⁴王華倒不見得真是祈求王道施行的太平治世，真正讓他切齒忿恨的是徐羨之等位勢崇重；史載王華與時人孔甯子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⁹⁵《宋書》甚至這樣說：

宋世惟（王）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⁹⁶

趙翼曾經說到南朝諸君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⁹⁷但從上述記載裡可以發現，即使出身士族之後，在求富貴、爭權位上，與寒士布衣同樣急切。王華毫不避諱的富貴之願，與從兄王曇首的表現就很不一樣。在誅徐羨之、平謝誨之後，王華、曇首與王弘一起輔政，王華常欲獨攬，而嘆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曇首則不但自己力辭封賞，也勸王弘減府中一半兵力配與彭城王義康，以消除義康對王弘權位的嫉恨。⁹⁸而當時與王華、王曇首同為文帝「五臣」之一，出身陳郡謝家的謝弘微，亦恆思減退；元嘉六年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⁹⁹沈約後來就稱美謝弘微是「簡而不失，淡而不流」，乃「古之所謂名臣」。¹⁰⁰

如果王曇首、謝弘微尋求簡淡、避忌權寵的表現彷彿今之「古」人，那麼王華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進入劉宋以後，爭求富貴已經是士、庶文化彼此交接、滲透後趨於一致的社會風氣。尤其是先貴而後富，以金銀服玩、園池伎妾自傲傲人，已經取代玄言雅量的鑑賞，而成為南朝「市井化」社會空間中最普遍的人倫評比。如宋文帝時徐湛之以皇室姻戚厚置產業，園宅妓樂，冠絕一時，又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嫌其侈縱」，每以為言。¹⁰¹然而，

94 見《宋書》，卷63 王華 傳，頁1677。

95 同註94，頁1677。

96 同註94。

97 《廿二史劄記》，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頁106。

98 《宋書》，卷63 王曇首 傳，頁1679-1680。

99 《宋書》，卷58 謝弘微 傳，頁1592-1593。

100 《南史》，卷20 謝弘微 傳，頁553。

101 《宋書》，卷71 徐湛之 傳，頁1844。

這並非徐湛之個人現象，當時還有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

京邑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¹⁰²

而徐湛之後人徐君蒨，於梁時隨湘東王蕭繹出鎮荊楚，常載伎肆意遊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而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當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見稱，於是：

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¹⁰³

這些新出的人倫品賞完全著眼在資產財貨，顯然「市井化」的社會空間在藉助權勢移轉來虛化士／庶對比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之後，¹⁰⁴ 連帶以粗鄙、狎謔的言行轉換名士流風的廟堂雅望，同時也在朝野之間吹刮起一股暴富縱侈的世俗習氣。

趙翼曾經批評南朝執掌機要之寒人，因為「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¹⁰⁵ 其實這由權位而至勢利的發達途徑，不僅侷限於寒人，而可以擴大到上下一體的爭逐競營；像是士族出身的褚裕之於廣州四年就「廣營貨貨，資財豐積」，¹⁰⁶ 武夫出身的沈慶之廣開田園，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¹⁰⁷ 這與布販出身而至恩倖的戴法興在聚積厚斂上並無二致。¹⁰⁸ 更何況說到即使已經享盡榮華富貴的君王，還爭奪人臣歸資、往劫他人貨寶，如：

宋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誦戲取之，要令

102 同註 101，頁 1845。

103 《南史》，卷 15 徐羨之 傳附徐君蒨，頁 441。

104 劉躍進談到南朝皇帝對士族實施軟中帶硬政策，一方面假意尊重，一方面以寒人執事，剝奪士族從政特權，使南朝士族放棄東晉時的政治野心、軍事實力，而棄武從文，走向文化士族的道路，如永明竟陵八友就是「聲歌爭逐，詩酒流連」的南朝士族文化的代表。參見《永明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68-76。

105 同註 97。

106 褚裕之為晉太傅褚裒曾孫，見《南史》，卷 28 褚裕之 傳，頁 745-746。

107 《宋書》，卷 77 沈慶之 傳，頁 2003。

108 《宋書》，卷 94 恩倖 戴法興傳，頁 2303。

罄盡乃止。（明帝時）（桓閔）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資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¹⁰⁹

宋元徽中，（張）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宋後廢帝）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¹¹⁰

吳興沈勃多寶貨，（宋後廢帝）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汝罪於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¹¹¹

從這些資料看來，出身寒賤並不必就是恣行聚斂的根由，反倒可以說是因為完全不必顧慮名檢所以如此放縱物慾，才會發生連皇帝都打家劫舍的事件。兩晉之間，石崇曾「劫奪殺人，以致巨富」，¹¹² 過江之初祖逖曾「使健兒鼓行劫鈔」，¹¹³ 針對這些事例，時人猶有批評餘地；¹¹⁴ 然入宋以來，配合士族參政權的弱化，名士風軌失去文化專寵的地位，簡淡玄遠逐漸隱退，而貪婪暴虐則假借市井屠酷放聲高呼、放恣隨便的形式，毫不避諱、無所遮掩的表現出來。如前文所述，宋孝武在廟堂之上狎侮群臣以為歡樂，後廢帝出入市里逢人擊剖，然後為樂，這與他們公開的爭奪、劫掠配合起來看，「市井化」不但成為南朝新貴躍登政治舞台的身分標記，也讓建康京邑成為夸談富貴、眩示資財的慾望城邦。

四

檢閱《南史》諸本紀，針對南朝帝王的記載中有一個關於儉／奢之辨的連貫主題，歷數清簡寡欲如宋武帝、¹¹⁵ 齊高帝、¹¹⁶ 齊明帝、¹¹⁷ 梁武帝¹¹⁸ 及陳

109 《南史》，卷 25 桓護之 傳附桓閔，頁 688。

110 《南史》，卷 25 張興世 傳附張欣泰，頁 692。

111 《南史》，卷 3 宋本紀 後廢帝傳，頁 89。

112 《世說新語》，怵侈 篇第 1 則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656。

113 《世說新語》，任誕 篇第 23 則，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559。

114 《世說新語》，任誕 篇第 23 則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談者以此少之（祖逖），故久不得調」，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559。

115 《南史》，卷 1 宋本紀 頁 28。

116 《南史》，卷 4 齊本紀 頁 113。

武、文帝；¹¹⁹而奢靡相承如宋孝武、宋明帝、¹²⁰齊武、齊廢帝鬱林王及東昏侯等。¹²¹當儉／奢成為這樣系列的論述，顯然是儉約有賴極力宣示，而奢靡已經到往而不反的地步了。齊高帝曾經下決心移易風俗，而說到：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¹²²

黃金與土石何止天壤，蕭道成的豪語在痛下決心之餘，也揭露了當時社會極端拜金的風氣。史載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討伐林邑，得黃金數十萬斤，¹²³是南朝最為可觀的一次黃金輸入，若加上四方進獻及透過海上貿易所輸入的明珠、珊瑚、琉璃、琥珀與薰香料，¹²⁴建康王朝可以稱得上是流香鑠金的世界。像是齊東昏侯為潘妃興築仙華諸殿，皆匠飾以金壁，又以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¹²⁵而陳後主為張貴妃起臨春三閣，其窗牖、壁帶、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盈後庭」。¹²⁶另外像齊文惠太子壯麗極目的東田宮苑，「觀者傾京師」，¹²⁷加上寒人近倖憑藉恩寵在京邑大起園宅，宋時阮佃夫可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餘里遠，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及，因此「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¹²⁸，梁時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臺池翫好莫不備具。¹²⁹上行下效的結果是，即使「庶賤微人」，皆務在貪污，爭飾綺羅、相競誇豪。¹³⁰所以當賀

117 《南史》，卷5 齊本紀 頁145-146。

118 《南史》，卷7 梁本紀 頁223。

119 《南史》，卷9 陳本紀 頁274、282。

120 《南史》，卷4 齊本紀 有云：「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頁103。

121 《南史》，卷4 齊本紀 載齊武生前「喜游宴、雕綺之事」，臨終才下詔禁絕奢麗，頁126。廢帝（昭業）事見 齊本紀，卷5，頁137；東昏侯事同見卷5，頁151-154。

122 《南齊書》，卷2，高帝紀，頁39。

123 《梁書》，卷54 諸夷傳，頁786。而《南齊書》，卷58 東南夷傳 作「數萬斤」，頁1013。

124 詳參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95-102。

125 《南齊書》，卷7 東昏侯本紀，頁104；「皆匠是以金壁」出自《南史》，卷5 齊本紀 東昏侯，頁153。

126 《南史》，卷12 后妃 張貴妃傳，頁347。

127 《南齊書》，卷21 文惠太子傳，頁401。

128 《宋書》，卷94 恩倖 阮佃夫傳，頁2314。

129 《梁書》，卷38 朱异傳，頁540。

130 見賀琛上奏，《南齊書》，卷38 賀琛傳，頁544。

琛奏請梁武帝以身率下，「貶黜雕飾，糾奏浮華」，梁武帝也只能以自己早已絕房事、不飲酒、不奏樂而腰身瘦削的刻苦形象來作無力抗辯了。¹³¹

針對建康王朝所以能極侈縱慾，歷史研究學者已經從富裕的經濟面來分析建康因為一方面有吳會沃野為富實之本，一方面藉長江為全國貨物集散地，還有交、廣地區廣大的海上貿易；換言之，是從地域背景說明建康作為一個商業都會，自然就會發展出奢侈靡費的生活。¹³²然而在六朝商業活動中最为特出的現象是經商份子極為複雜，而屠酤列肆的活動又顯現出不同性質。除了平民經商營生，東晉以來屯封山澤的北來士族或當地豪族，已經加入農產販售、礦冶及製瓷產業以及運輸業等，¹³³南朝時期，前文提及沈慶之廣開田園之業，¹³⁴孔顛二弟由外地還都即趁便經營販運，¹³⁵而如宋豫章王子尚等諸皇子更是開店設邸、甚至兼營高利貸，¹³⁶梁時臨川王蕭宏更要求以田宅邸店做為抵押，逾期未還則奪其田宅。¹³⁷這其中參與者除了士族、土豪，更加上劉宋以來素族天子的宗室以及寒庶出身的佐國功臣。¹³⁸這麼普遍經商的風氣，絕對不同於平民謀生的行為，當然也早已打破公侯卿士不與民爭利的清貴地位，¹³⁹更重要的是結合劉宋以來士/庶在政治權位上的此消彼長，高門大族恥於聚斂、詩書傳家的風範逐漸失去主導力量，¹⁴⁰公廷擬於市井的屠酤風氣勃然發展。也就因此，並無法完全由建康居長江沿岸樞紐或作為都城的地理位置來完全說明這個城市的商業文明，而應該從「市井化」已經成為一種門第淡薄、士族虛

131 《南齊書》，卷 38 賀琛 傳，頁 549。

132 參見劉淑芬，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收入《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 81-102。

133 參見劉淑芬，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收入《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 210-238。

134 同註 107。

135 同註 19。

136 《宋書》，卷 82，沈懷文 傳載沈懷文以「列肆販賣，古人所非」上言宋孝武帝，頁 2104。

137 《南史》，卷 51 梁宗室 蕭宏傳，頁 1279。

138 許輝主編《六朝經濟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對六朝貴族、官僚普遍經商有更多人物例證，頁 359-364。

139 郭祖深曾上書梁武帝談到朝政弊端，其中有「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見《南史》，卷 70 循吏 附郭祖深傳，頁 1721。

140 蘇紹興認為：「西晉以來，玄風彌扇，士族競事隱遁，恥談積聚，以博清譽」，見《兩晉南朝的士族》，頁 54。因此本文暫時將南朝宮廷中也存在的好古、清儉、談詩論義的風氣歸為與市井化相對的士族遺風，屬於兩晉流傳下來的另一種宮廷文化的面向。

位之後新出的文化性格、生活品味，才能完整解釋為什麼連皇宮內院都要模擬市集而享受屠酤之樂。如前述，齊東昏侯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因此當時百姓歌曰：

閱武堂，¹⁴¹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¹⁴²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生動描述由宮廷越界向市井那種突破階級身分、言行規範所帶來的解脫快感；然而當整個屠酤行為是在窮奇極麗的芳樂苑（前稱閱武堂）中進行，這些解脫、突破並不是下放為平民文化，反而是建構特權的象徵論述。

模擬市井屠估成為一種權位階級論述，其實可以遠溯漢末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的事例，¹⁴³然而東晉以來，結合江南的民風俗謠，奢華府苑中列肆屠酤之樂再加上妖冶淫放的吳俗聲歌，更完備了南朝宮廷「市井化」的系列表現。換言之，宮廷市井化的事例也許出現在不同歷史時期，但是這個文化現象在南朝獨特的社會空間中會表現得比較豐富顯著。例如東晉中晚期司馬道子、謝石的例子，《金樓子》記載：

司馬道子於府第內築土山，穿池沼，樹竹木，用功數十百萬。又使宮人為酒肆，酤賣於水側，道子與親幸乘船就其家，飲宴若在市肆，以為笑樂。¹⁴⁴

「飲宴若在市肆」就如同東昏侯於苑中立肆屠肉，是為了享受市井喧鬧諧戲而無所拘束的樂趣。史載司馬道子曾在東府置酒，宴集朝士，其中謝安弟謝石也在受邀之列：

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¹⁴⁵

141 時改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見《南史》，卷5 齊本紀 東昏侯，頁154。

142 《南史》，卷5 齊本紀 東昏侯，頁155。

143 《後漢書》，卷8 孝靈帝紀，頁346。

144 梁元帝，《金樓子》（知不足齋叢書本），卷3，頁21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46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0）。

145 《晉書》，卷84 王恭，頁2184。

所謂「委巷之歌」即江南吳聲，¹⁴⁶過江以來朝中權貴逐漸親近吳聲，謝石的例子正說明被視為「妖而浮」¹⁴⁷的吳聲歌曲已成為權貴階級間廣泛流行的娛樂。但更重要的是吳歌流行於上層階級的現象不能單獨看待，¹⁴⁸謝石吟唱吳歌配合司馬道子於東府立肆酤賣，可以說是進一步完整了模擬市井的文化象徵。謝石曾與謝玄大破苻堅，功在邦國，但也因為聚斂無度、貨贖京師而取譏當世，所謂「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¹⁴⁹明顯類同於司馬道子的奢僭靡麗，委巷之歌當然也就如同屠酤之樂已成為權貴娛樂方式之一。而吳聲歌曲本產生於巫風盛行的南方，通過歌舞自然表現祭祀儀節中的縱放與熱烈，所謂「妖而浮」真切傳達出民間歌舞迎神所瀰漫的的褻慢狂歡的性質，¹⁵⁰正與東府「若在市肆」的吆喝喧鬧、隨便暱近相互應和，而共同建構了特定階級的娛樂體系（systems of pleasure）。

從這個角度重新看待當時產生於建康的吳聲歌曲，¹⁵¹以及後來也盛行於京畿的西曲，¹⁵²除了以往研究者最常注意的產生時代、地域性、創作本事之外，¹⁵³也許可以比較全面考察現在僅存文本（text）資料的吳歌、西曲在整個社會環境（social context）裡與其他成份互動下所扮演的角色。《宋書》樂

146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中以《北堂書鈔》引《晉中興書 太原王錄》所載此事，「委巷之歌」正作「吳歌」，頁 13。

147 《世說新語》，言語 篇第 104 則載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頁 123。

148 如王運熙自述 研究樂府詩的一些情況和體會 中，提到閱讀《晉書》、《宋書》、《南史》等史籍後，發現不少記載：「表明六朝的貴族上層階級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喜歡聽吳聲、西曲這類通俗樂曲」，這對於理解吳聲西曲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大有幫助，（見《樂府詩述論》頁 507）；他也注意到江左帝王、官僚多為寒素出身，而統治者對商酤生涯極為愛好等現象（見《樂府詩述論》頁 18）。但是對於宮廷文化如何藉助模擬市井而建構新出的政治話語與權力論述，則未進一步申論。

149 引自《晉書》，卷 91 范弘之 傳中范弘之議謝石諡號，頁 2362。

150 詳參李豐楙，六朝樂府與仙道傳說，《古典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第一集，1979 年 12 月，頁 67-96。

151 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44 曰：「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頁 640。

152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中認為要說西曲產生於西方，僅能就開頭言，西曲中多商人歌，而商人多在荊、揚間經商，因此西曲後來也和吳歌一樣流行於京畿了。頁 23-27。

153 參見《樂府詩述論》中如 吳聲歌曲的產生時代、吳聲西曲的產生地域、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吳聲西曲中的揚州 等。

志 記載「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¹⁵⁴ 雜舞與吳聲、西曲同屬清商樂，雜舞透過宋孝武施於殿庭，可以推想原屬民間的吳聲、西曲已經在廟堂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¹⁵⁵ 這是僅僅就樂府文學的發展所作的解釋，然而如前所引述，宋孝武曾因王導後人王僧達犯忤凌人而加以構陷，同時自即位以來「士庶雜選」，不拘門第，朝中能臣崇尚之、佞倖如戴明寶、戴法興，還有以才學知名的東海鮑照皆出身寒微。¹⁵⁶ 史載孝武帝好為文章，自謂無人能及，「(鮑)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¹⁵⁷ 表面上看來是鮑照刻意寫得鄙俗累贅，以滿足帝王的自滿自大，然而關於語文的粗鄙，究竟是對比出彼此的優劣或根本是取悅帝王的語言策略，可能還有深入探討的餘地。宋孝武帝其實不討厭粗鄙，甚至還以粗言鄙字狎侮群臣而自得其樂：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¹⁵⁸

這就如同前廢帝以「豬王」戲謔明帝一樣，都是南朝宮廷「市井化」的現象之一，因此鮑照寫得鄙俗也可能是為了趨附布衣出身的帝王的喜好。鍾嶸《詩品》載其從祖鍾憲所謂「大明(宋孝武)泰始(宋明帝)中，鮑、休美文，殊以動俗」，¹⁵⁹ 休、鮑比論，容或猶有爭議，¹⁶⁰ 然而在高下評比之外，鮑照與惠休的詩作在模擬世俗淫豔的江南民歌上，倒是趨於一致。

《宋書》稱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鍾嶸以為惠休「淫靡」，¹⁶¹ 宋顏延之則每每鄙薄惠休這種綺豔詩作，謂人曰：

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¹⁶²

154 《宋書》，卷 19 樂志，頁 552。

155 參考《樂府詩述論》頁 14。

156 蕭子顯說「(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南齊書》倖臣 傳前言，頁 972。

157 《宋書》，卷 51 宗室 臨川王義慶傳附鮑照，頁 1480。

158 《宋書》，卷 76 王玄謨 傳，頁 1975。

159 引自陳延傑，《詩品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1 臺八版)，頁 38。

160 像鍾嶸就認為時人惠休匹之鮑照，「恐商周矣」，見前註，頁 37。

161 見陳延傑，《詩品注》頁 37。

惠休制作「委巷歌謠」與東晉謝石所為「委巷之歌」都是指當時採錄自民間而重新編曲作詞，流行於建康上層階級的樂府民歌，也就如同鮑照「險急」、「淫豔」而被批評為「鄭衛、紅紫」的作品；¹⁶³謝石歌於司馬道子的奢華府邸，鮑照作於孝武帝「雕樂綺節，珠窗網戶」¹⁶⁴的殿堂，而惠休則游於貴戚徐湛之門下。徐湛之為徐羨之從孫，如前述，徐羨之是劉宋建國功臣，與劉裕一樣出身布衣，又無學術，徐湛之則以皇室姻戚而與當時安成公（食）臨汝公（飾）並名奢豪。史載元嘉二十四年，湛之出為南兗州刺史，修整廣陵舊樓：

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孝武）命使還俗。¹⁶⁵

顯然惠休與徐湛之、宋孝武帝皆有往來，那麼加上於孝武時入朝的鮑照，當時以委巷歌謠標世動俗¹⁶⁶的鮑照、惠休，在南朝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也許還有雅／俗價值的爭論，然而在社會文化象徵上則具有不容忽視的關鍵性；「委巷之歌」或說是吳聲西曲在這裡都成為一種新出的權力論述，標誌著素族寒人進入政治核心、競逐富貴榮華，可以出語鄙俗、縱情淫靡，連皇宮內苑、王公府第都鼓盪著市井風情的樂園意象。¹⁶⁷

《南齊書》曾經如此記述：「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¹⁶⁸於是宋末齊高帝輔政時，王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

162 《南史》，卷 34 顏延之 傳，頁 881。

163 蕭子顯，《南齊書》，卷 52 文學 傳論曰：「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頁 908。

164 《宋書》，卷 92 良吏 傳前言論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樂綺節，珠窗網戶」，頁 2261。

165 《宋書》，卷 71 徐湛之 傳，頁 1847。

166 前引鍾憲所謂「鮑、休美文，殊以動俗」，而蕭子顯《南齊書》，卷 52 文學 傳論曰：「休、鮑後出，咸亦標世」，頁 908。

167 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 一文認為南朝宮廷中流行吳歌西曲，是因為宮廷中聚集了大批依附皇室的市里小人，尤其是商人，頁 113-120。不過本文也提及如東晉高門出身的謝石亦愛委巷歌謠，可見與其說是南朝商人進入宮廷才開始流行吳歌西曲，不如從士／庶模糊界限後，轉換了上層階級的娛樂風向入手，會更為全面。

168 見卷 46 蕭惠基 傳，頁 811。

帝乃使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¹⁶⁹表文中說到：「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¹⁷⁰一語道盡當時市里俗謠風靡王公縉紳的實況。蕭道成即位後，一次於華林園宴集，使群臣各效伎藝：

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¹⁷¹

司馬相如的封禪書在於尊顯帝國盛德，¹⁷²與柔情繾綣的子夜歌，¹⁷³同時出現在宮苑宴集上，不但模糊俚俗／雅正的界限，書寫兒女私情的樂府民歌配合樂舞之後，甚至可以堂而皇之成為宮廷娛樂的主體系，而與封禪大事在喧笑中分庭抗禮。如果還注意到王敬則「拍張」助興，《南史》中詳細描述：

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¹⁷⁴

《南齊書》載王敬則「善拍張，補刀戟左右」，¹⁷⁵「拍張」應是指一種張手拍擊的胡戲，¹⁷⁶廟堂之上拍張戲弄，一方面是王敬則本來的出身習氣，一方面當然也表示在南朝政治空間中，是允許這樣一種庶民型態的存在。像王敬則雖然名位顯達，不但不忘拍張，甚至是：

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¹⁷⁷

169 《南史》，卷 22 王曇首 附王僧虔傳，頁 602。

170 《南齊書》，卷 33 王僧虔 傳，頁 595。

171 《南齊書》，卷 23 王儉，頁 435。《南史》，卷 22 記載略有出入，其中沈文季歌「子夜來」（頁 593），王運熙以為「子夜來」三字是「子夜」歌的和聲，《樂府詩述論》頁 52。

172 封禪書 見《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卷 117 司馬相如 列傳，頁 3063-3065。

173 參見《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44 清商曲辭 吳聲歌曲所錄「子夜歌」42 首，頁 641-644。

174 《南史》，卷 22 王曇首 附王儉傳，頁 593-594。

175 《南齊書》，卷 26 王敬則 傳，頁 479。

176 參見張自烈《正字通》（臺南：莊嚴文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卯集中手部「拍」字下曰「又拍，張手搏拚，胡之戲也」，並引王敬則事為例，頁 197-549。

177 同註 175，頁 484。

據陳寅恪先生考察：「江左士族操北語，而庶人操吳語」，因此東晉南朝的官吏「接士人則用北語，庶人則用吳語，是士人皆北語階級，而庶人皆吳語階級」。¹⁷⁸原屬庶人階級的王敬則現在位居三公，這是士／庶階級在南朝政治體制中權位消長的又一事例，同時不論對待士人或庶民，王敬則都一樣口操吳語，與初時吳士習熟北音（如陳寅恪所舉王融例）的情況相對比，這明顯是伴隨著階級升降、權力轉移而改弦更張的政治話語；這絕非僅僅因為敬則出身庶人，而是因為布衣庶民成為握有權力的發話者，所以自在地運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將吳語或吳聲視為南朝宮廷中新出的權力論述，就表示它可以和北語一樣成為權力體制中周旋往來的政治話語，比方齊明帝即位後，誅戮高、武帝諸子孫，¹⁷⁹王敬則身為高、武舊臣，心懷憂恐；當時敬則子仲雄曾於御前鼓琴：

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¹⁸⁰

王運熙說這則資料「令人想起東周時代列國卿士大夫斷章取義地吟誦詩經的情況」，¹⁸¹說它斷章取義，因為 懊儂歌（或作「懊惱」）原是吳地流行的情歌，後石崇仿作一首贈愛妾綠珠，如今以男女愛怨來暗喻君臣猜疑，當然是刻意比附；¹⁸²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南朝朝廷中運用吳歌就彷彿先秦士大夫於出使會盟時賦詩言志的情況，毋寧肯定了吳聲歌曲已經成為政治話語的事實。這其實可以與東晉朝堂之上的「洛生詠」形成對比。《世說新語》有一則關於謝安的故事：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益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¹⁸³

178 《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金明館叢稿二編》東晉南朝之吳語，頁267-272。

179 《南齊書》，卷45 宗室 附始安王遙光傳記載：「上（明帝）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並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 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頁789。

180 《南齊書》，卷26 王敬則 傳，頁485。

181 《樂府詩述論》，頁15。

182 參《樂府詩述論》，吳聲西曲雜考 第八節「懊儂歌考」，頁73-75。

183 《世說新語校箋》，雅量篇 第29則，頁282-283。

所謂「洛生詠」即洛陽書生吟詠時的重濁音調，謝安能作洛生詠，不但引起社會名流仿效，¹⁸⁴而在此甚至是以吟詠的音調、姿態而解除桓溫佈置的重重殺機，並且存續了東晉國祚。而後來當桓溫之子桓玄不解社會上為何流行「妖而浮」的「吳聲」，當然就不只是表露「中原人士保其北人音容，以與南方吳音競美」的心態，¹⁸⁵操「北語」或者重「吳音」，重點不僅是南／北差異，還是士／庶之別；換言之，吳音在操中原北語、效洛下之詠的士族社會中興起，其實是牽涉了士庶地位轉換、階級升降所帶來的政治語言的新變。

五

劉師培論南朝文學，認為側豔之詞起自晉宋樂府民歌：

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則惠休。特至于梁代，其體尤昌，宮體之號，自斯而始。¹⁸⁶

對於這南朝文學史上「側豔之詞」發展的體系，張伯偉從休、鮑以下，還補充永明八友中豔詩作得極多的沈約，以及呼籲「京師文體」應該從謝靈運轉而以沈約、謝朓為楷模的梁簡文帝蕭綱。¹⁸⁷而其實豔情宮體的形成早在蕭綱鎮守襄陽（雍州）期間，¹⁸⁸宮體詩與民歌西曲的關係也是貴族市井化、市井貴族

184 見《世說新語校箋》，雅量篇 第29則劉孝標註引宋明帝《文章志》：「安能作洛下書生詠，後名流多效其詠，莫能及。」頁283。

185 楊勇 雅量 篇第29則校箋1，頁283。

186 劉師培，宋齊梁陳文學論略，《中國中古文學史》（臺北：育民出版社，1979），頁91。

187 張伯偉主要是從佛教文化中刻畫聲色的成份如何影響南朝文學做細密探索，他認為蕭綱所謂「京師文體」「競學浮疏，爭為闐緩」，並在謝靈運、裴子野之外，提出謝朓、沈約為述作楷模，正是受戒之後，而這封與湘東王書全名應為答湘東王和受戒書；所以如果佛教文化影響了蕭綱對於詩歌創作的大膽放蕩，那麼蕭綱以繼承永明體（尤其是豔情詩不少的沈約）作為文學改革宣言，也是理所當然。參見《禪與詩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宮體詩與佛教，頁187-223。關於沈約與南朝豔情詩形成的關係，亦可參考興膳宏 豔詩の形成と沈約，《日本中國學會報》，第24集，頁114-134。

188 曹道衡認為《梁書》徐摛傳所謂「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的記述是有疏忽的，因為蕭綱於中大通二年自雍州調回建康任揚州刺史，次年昭明太子薨，蕭綱立為太子，但徐摛同年因朱异之間即出為新安太守，因此宮體詩的形成並非在蕭綱位居東宮以

化兩面一體的事。¹⁸⁹ 如果再加上陳後主使宮人與狎客共賦豔麗新聲，¹⁹⁰ 於是從宋孝武帝、齊武帝時期到梁武帝、陳後主的南朝宮廷中，這個文學上「側豔之詞」或「委巷之歌」的發展，其實已經透過作為娛樂體系或挪借為政治話語而成為南朝宮廷文化的主流；其結果一方面是宮廷有「市井化」的風情，其實也是假借市井型態放任「私慾化」的權力論述。整個論述從豪華富麗的背景中流盪開來，鄙語喧喝與珠翠金玉共鳴交響，淫聲豔辭也與雲輦龍舟相互輝映。這與漢代京都論述一方面強調合禮中法的富麗，一方面由富麗尚想凌雲飄風的遠遊成仙既不相同；也與東晉廟堂中瀟灑清談玄言，緬懷正始之音，吟誦洛下之詠的風尚有別。¹⁹¹ 所有作為都邑的城市當然都無可避免成為家國（與帝王）權力慾望的載體，然而不同型態的慾望論述，讓建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城市意象。

梁武帝末年，蕭綱所賦寫的 圍城 其實就某種程度象徵了南朝建康自築或深陷長圍的虛實景況。據史書記載，蕭綱於侯景兵臨城下時，作有四言 愍亂詩 與 圍城賦¹⁹²，愍亂詩 所謂「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就是批評當時作威作福的權臣朱异。而今僅見末章的 圍城賦 進一步描述到：

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威福，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¹⁹³

這段話其實詰難朱异於梁武朝中大權在握，卻在納降侯景之後又力主與魏通

後，而是在徐摛追隨於雍州襄陽期間，見《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158。

189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灣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87）早注意到民歌西曲的貴族性格，認為西曲是依靠出鎮荊、雍的王室貴族，才由民間走入宮廷，見第六章第三節，頁277-286。

190 《南史》，卷12 后妃 張貴妃傳，頁348。

191 請參考鄭毓瑜，東晉建康論述 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及 賦體中遊觀的型態及其所展現的時空意識 以天子游獵賦、思玄賦、西征賦為主的討論，《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文學學院，1996），頁411-432。

192 《梁書》，卷38 朱异 傳僅及 圍城賦，頁539；《南史》，卷62 朱异 傳又及 愍亂詩，頁1518。

193 同前註《梁書》，頁539。

好，致侯景心生疑懼，舉兵謀反，天下遂陷入動盪不安的局面。¹⁹⁴當時侯景十萬大軍由朱雀航長驅直入，燒毀大司馬門，直逼臺城（建康宮城）。梁以前臺城原只有二重宮牆，天監十年，增築一道宮牆，愈形堅固，¹⁹⁵侯景苦攻不下，乃「築長圍以絕內外」，¹⁹⁶蕭綱所以賦名為「圍城」。羊侃時輔助宣城王都督城內軍事，與侯景軍在城內外展開激烈攻防，賊人以尖頂木驢攻城，羊侃則擲雉尾炬以焚之，賊人於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羊侃則挖掘地道，潛引其土，致山不能立。後來城內土山因大雨而崩，賊乘隙而入，羊侃令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再往裡築城以阻止賊人進入。¹⁹⁷而後宋嶷降賊，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¹⁹⁸

後來議和失敗，侯景決水攻城，晝夜不息，宮城終於淪陷，擄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妃，又聚死屍燒之，臭氣聞十餘里，而宮城外原本熱鬧繁榮的秦淮南岸的民居營署也被燒毀殆盡，一時之間，「大航南岸，極目無煙」；¹⁹⁹太清三年百濟國不知京師寇亂，猶遣使進貢，既至，「見城邑丘墟」，並號慟涕泣。²⁰⁰從這些史料，可以揣想彼時這座圍城隳敗荒涼的景象；然而長圍之於建康城，卻不僅僅發生於梁武末年，當年蕭衍起兵伐齊東昏侯，亦「命諸軍築長圍」，時朝廷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²⁰¹死亡的詛咒、滅絕的宿命似乎已成為「圍城」反覆不息的象徵。但是，作為一座圍城，可以是深陷重圍，自然也可能是自我範圍，「長圍」之名最先正是起於東昏侯於市井巷陌所圈圍的遊處區域。東昏侯喜出遊走，不欲令人見之，²⁰²時地無定，日夜驅迫，百姓無復作業：

194 相關史事參見《梁書》，卷 56 及《南史》卷 80 賊臣 侯景傳。

195 《梁書》，卷 2 武帝 紀天監十年「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頁 51。《建康實錄》卷 17 云「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頁 370-540。

196 《梁書》，卷 56 侯景 傳，頁 842。

197 《梁書》，卷 39 羊侃 傳，頁 560-561。

198 《梁書》侯景 傳，頁 844。

199 《南史》賊臣 侯景傳記載王僧辯兵援建康，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頁 2014。

200 《梁書》，侯景 傳，頁 853，及卷 54，諸夷 百濟，頁 805。

201 《梁書》，卷 1 武帝 紀，頁 12。

202 《南史》，卷 5 齊本紀 東昏侯傳，頁 153。

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遍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識焉。²⁰³

前文提過東昏侯於芳樂苑中設店屠肉，那是宮廷模擬市井；此處則走入市井，放任私慾在市井中圈圍出如同宮苑的遊樂處。其中驅斥百姓、懸幔高障所圍的「屏除」，具體說明了南朝宮廷與市井之間表面彷彿實際區隔的真相；「屏除」內吹奏當時流行的西北民歌以為娛樂，²⁰⁴「屏除」外是老少震驚、啼號塞道。這則資料最後以「長圍」為識，其實透露「長圍」一語雙指的意涵，它既是指建康城外逼兵甲，也是指內迫奢靡的建康城。

如此一語雙指的「長圍」，想必也是蕭綱《圍城賦》暗喻外有侯景、內有朱异最終的意旨所在。朱异寒士出身，與歷來寒人機要一般善於揣摩上意、討取歡心，像納降侯景就是朱异探得梁武心意加以促成的；同時也如同戴法興、阮佃夫、茹法珍等恩倖一樣，貪財冒賄，奢華無度，「起宅東陂，窮乎美麗」，「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²⁰⁵史載朱异資產與當時由北南歸且於侯景亂時都督城內軍事的羊侃相埒，²⁰⁶而羊侃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首，府中除妙盡奇曲的歌者王娥兒、屈偶之，還有舞人孫荊玉能反腰帖地、張淨琬纖細如能掌中舞等，²⁰⁷繁華綺靡就這樣張設在江南風情的聲歌樂舞中，而可以與謝石、惠休的委巷之歌在歷史長河中遙相應。梁代朝中奢華景況其實不待武帝晚年，天監年間蕭衍六弟蕭宏是最顯著的例子。前文提及蕭宏經營高利貸，逾期

203 引自《南史》，卷5 齊本紀 東昏侯，頁152-153。《南齊書》，卷7 東昏侯 本紀，記載較簡略。

204 《樂府詩述論》梁鼓角橫吹曲雜談 中認為所謂「羌胡伎」是一個內涵更廣的名詞，泛指西北少數民族的樂曲，當也包括鼓角橫吹曲在內；而這些原本施行於軍中的樂曲「並被一些嗜好聲色的君王、官僚應用於儀仗隊或作日常娛樂」，頁471。

205 關於朱异起宅東陂、極好聲色，見《南史》，卷62 朱异 傳，頁1516。《梁書》，卷38 朱异 傳未見載及。

206 《南史》，同註205。

207 《南齊書》，卷39 羊侃 傳，頁561。

未還則奪人所押抵的田宅，而他的嗜錢貪吝表現最徹底的莫如聚錢三億餘萬：

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梁武)帝與(丘)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
 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²⁰⁸

蕭宏恣意聚斂，庫室將近百間，是庫室收藏了錢財貨物，其實也可以說是貪念物慾於都下圈圍成一間間深鎖的府庫。從高障到庫室，內裡盡是笙歌樂舞、流香鑠金，而被遮掩、區隔的是相對在外的戰亂、死滅、啼號，以及為洪波淹灌的御闕，為戰火焚燒的火城 建康。

模擬市井的南朝宮廷文化，終究沒有推展出普及於全民的烏托邦式遠景 (utopian character oriented toward the future)，²⁰⁹ 所有恣意的奢華、誇張的粗鄙、放肆的淫豔，都只是為私己的品味、個人的愛慾服務；就像宮體詩中肉感形象的美人，只是供擁有的者狎玩、擺弄而成為可以估價、交易的財貨項目，而不會是庶民狂歡節中那代表「肥沃、生長以及極度豐饒」(fertility, growth, and a brimming-over abundance) 的肉體形象。²¹⁰ 而當市里廣場的論述其實萎縮至於衽席閨闈²¹¹ 之內，竟與建康王朝的勢力版圖由劉宋初期北至長安、盡得河南之地，至於侯景亂後，江北之地全數失陷有者彷彿同步的發展，²¹² 或許「長圍」的逐漸形成，並不只是南朝宮廷文化的象徵，也是見證建康王城在喧鬧與死寂、繁華與腐朽中反覆流轉的歷史意象。

208 《南史》，卷 51 梁宗室 蕭宏傳，頁 1278。

209 巴赫汀認為，狂歡節中的自由解脫 那種面向未來的烏托邦性格，雖然只能出現於全民參與的節慶中，但即使歷經十七世紀以來對於民間文化的嘉年華形式的縮減與弱化，它仍然持續豐富不同地區的生命與文化，見Rabelais and His World, 頁 33-34。

210 在狂歡節慶中，除了粗鄙、污穢的話語，赤身裸體也一掃罪惡的陰影，成為自由活力的正面形象，見Rabelais and His World, 頁 19，中文解釋參見劉康《對話的喧聲》，頁 287。而關於宮體詩的美人形象請參見鄭毓瑜，由話語建構權論宮體詩的寫作意圖與社會成因，《漢學研究》13：2 (1995.12)，頁 259-274。

211 魏徵於《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35 經籍志 集部總論言及宮體詩是「止乎衽席之間」、「思極閨闈之內」，頁 1090；而本文重在指出從吳聲至於宮體的「側豔之詞」的脈絡，正是南朝文化史上挪借市里的委巷歌謠而發展成宮廷私慾論述的過程。

212 分見於《通鑑地理通釋》卷 13，「宋重鎮」、「梁重鎮」條下所述，頁 191、196。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Beseiged City: A Profile of the Jiankang Court Culture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Yu-yu Cheng^{*}

Abstract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culture of the Jiankang capital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mutual borrowings, imita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opposing cultural fields of the court and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public community and the private individual. On the one hand, we discuss phenomena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uch as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ti and plebeians, humble scholars and hermits evolving into powerful speakers, and the court beginning to imitate the indulgent atmosphere of civil communities and marketplaces. On the other hand, we delve in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time to see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from folk ballads to the lewd and colorful court style was paralleled in the court culture by developments in the entertainment system and borrowings in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time. As a result of this trend, the court not only takes on the style of the city and the marketplace but also borrows its discourse of letting personal desires run amok. This, in turn, completes the image of Jiankang being a “besieged city”, a city of desire that is cut off from a more plebeian paradise.

Key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Jiankang, court culture, marketplace style, social space, city image

* Yu-yu Che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